

城人物简介

王一鸣,经济学博士,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成员。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宏观经济研究》主编。曾多次参与国家中长期规划的前期研究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的起草。

城个人观点

王一鸣强调,要推动金融业加快创新发展的步伐。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在股市期货证券中已形成相当的优势,扮演了重要角色。它要与伦敦这样的城市并论,就要进一步强化金融功能,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没有本币的国际化,上海要扮演国际化的结算、运营、财务、定价中心就很难。现在人民币的国际化在加快,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功能的升级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制度上的开放也在加快,从各方面的信息来看,有关部门正在加快政策的开放。当然,王一鸣指出,这些是很重要的外部条件,因为这个不仅仅取决于上海本身。



王一鸣在上海举行的「五十人论坛」上

本报记者 胡晓芒 摄

王一鸣认为创新是打造核心竞争力最主要的元素 上海开放：瞄准纽约和伦敦

本报记者 吴强

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随着中国在全球位置的提升,现在中国经济已经排在全球第二位,上海在我国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也会有大幅度提升。基于这个理由,王一鸣觉得上海讨论对外开放问题,必须

有一个全球化的视野,可以瞄准美国,以它的中心城市作为一种参照,来讨论上海的开放问题。当然上海也要有自己的独特性。王一鸣在上周末举办的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上海会议上从三方面阐述他的见解。

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

王一鸣指出,中国目前 30 多年高速的经济增长,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和对外开放分不开的。而现在,对外开放的形势面临变化:

从国内看,首先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发生阶段性变化,从过去高速的、两位数的增长阶段走向个位数增长的阶段,而且这种 7%-8%的增速可能将是一个常态。考察东亚国家,就会发现拐点以后经济增长减速,经济就进入了一个周期性阶段是正常现象,比如日本、韩国。中国也一样,经历了拐点的变化。2007 年中国实际上已经历拐点,而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则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阶段性转变。目前,沿海城市经济增速普遍在放缓,这也是正常的。

第二个变化是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将很快喪

失,虽然现在相对还有比较优势。王一鸣去年到印度参加中印战略对话,看到孟买工人的平均工资大约 900 元,而在广东的鞋厂,最普通工人工资都要三四千元。因此,中国再搞这种加工贸易,优势已经在逐步减弱。

第三个变化是劳动力的减少会带来储蓄的下降,投资率的降低。大规模集中式的投资模式也要随之相应变化。中国应该要提高要素生产率。以前中国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要素大规模转移,下一步提高要素生产率必须靠创新、靠研发等。

从外部环境来看,首先,未来一个时期全球经济可能会出现一个相对低迷的阶段。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调低了最近两年的全球预

测。对中国影响就是外部需求扩张放缓,原有的分工模式在发生变化。其次,金融危机以后存在的机制推动了分工模式的转换,东亚生产、欧美消费、中东拉美提供能源资源这种传统的分工关系也在发生变化。

再有是市场替代效应,新兴经济体对中国的替代效应在强化,他们延续了我们以前的低成本优势这套模式,替代了我们的传统市场。当然中国也面临一些机遇,新兴市场对我们投资的需求会有所增长。另外我们走出去,建立全球化市场体系的条件也更加完备。以前我们要走出去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现在这种条件逐步完备。这些变化都要求我们推进新的转型,而且这种转型要通过改革开放的形式来推进。我们要提升价值链,以前这种低价值区段比较值已经减弱,要从要素的区段转向创新的区段,从成本的竞争转向技术的竞争。

最主要的。

从创新方面看,上海有成长型、孵化型的企业,但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不多,像华为、中兴、腾讯、阿里巴巴、百度,这些企业有相当的影响力,类似的企业在上海相对不多。

未来一段时间,上海明确要建设四个中心,这是长远的目标,而在短时间内应该有更清晰的定位,王一鸣概括了三条:上海应该是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引领者,在现代服务业发挥引领作用;在金融业开放方面应该是引导者,金融业开放需要相应的基础,比如人民币的国际化,上海可以去推动,去引导;上海应该是长三角对外开放的门户,进入长三角都要经过上海,资源、要素的交换,上海是一个枢纽。

从市场体系看,要素市场改革尚不足以支撑现代服务业的市场需求,包括服务价格、人力资源市场,特别是人才市场包括金融市场不健全,都难以对现代服务起到支撑的作用。下一步怎么办?要进一步推进服务业的开放,既包括依托上海的制造业,与上海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通过多层次的整合,来促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的外包,通过市场来形成专业化发展,包括研发设置、标准测试、营销、供应链管理等等;同时,也要吸引国外大企业、民营企业和创新型企业来上海设立总部,地区总部、生产基地、营运中心、研发中心等功能性分支机构。

上海现代服务业应当突破行政限制

王一鸣建议,未来上海需要通过服务创新来进一步抢占服务发展的高地,服务的创新跟制造的创新完全不一样,制造业是由技术创新来支撑的,而服务业更多的是依靠商业模式创新,而商业模式的创新需要制度的灵活性。上海还应当加快制造业的服务化进程。

国外的大型设备制造公司,比如西门子等,现在销售的产品实际是最终解决方案。制造的服务化进程正在加快,服务的增加值在企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也逐步提高,制造业本身也在发生变化。

上海现代服务业应当突破行政限制,与长三角制造业共生融合,发展现代服务业需要足够的市场需求,需要推进共生的融合关系。

提高开放度,让民营企业进来

王一鸣看重民营经济对上海的重要性。他认为,上海国有经济比重一直是比较高的,尽管这几年也在“退”。从这几年的实践看,民营经济创新活力很有优势,这几年涌现出来的标志性企业,绝大部分都是民营企业,所以这方面的开放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关键要提高开放度,让民营企业进来。

怎么向民营经济开放,是培育上海创新活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举措。上海要主动学习深圳、杭州的经验,这两地的民营经济相对比较活跃。一个开放的经济才会有活力,才会有持续的增长力,因为开放才能获得更多,在更大范围获得支持,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

上海在我国对外开放中应扮演的角色

从全球层面,上海应该和同样的大规模的新兴城市作对比。上海与全球经济重镇,比如纽约、伦敦比,它们当然还有一段距离,具体表现在产业转移、金融创新、文化创意、公共服务、高等教育,以及经济的国际化方面等。王一鸣认为,上海的另一个参照系是东亚地区大城市,比如香港、新加坡、东京。未来上海要超越这些东亚城市,要敢于超越这些城市现在所扮演的角色。现在上海推进服务贸易、搞自贸区,进行改革,都是在为这个超越做准备。上海突破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利用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金融开放契机,在竞争中

胜出。以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为依托,上海有这个条件,也有这个可能。

从国内层面看,上海在长三角转型中应该发挥更大的灵魂作用,如果上海不能有效利用长三角的资源,也就很难有效整合全国的资源,更好地扮演它的角色。而从上海自身来说,则是怎样培育自己核心竞争力的问题。王一鸣指出,上海目前两个元素比较薄弱:一个是创新元素,另一个是文化元素。上海有文化的制造业基础,也有成型的成规模服务业,但还是缺乏这两个核心的要素,其中创新是打造上海核心竞争力

上海进一步推进服务业的开放

王一鸣认为,上海扩大改革开放首先在于现代化的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绝大多数都是生产经济,上海有很好的基础,生产素质齐全,但目前这种良性互动似乎还没有完全形成。上海有很多大规模的制造业,例如电子信息、芯片、医疗器具、汽车、石化、钢铁、船舶等,但这种内化的企业作用还没有外化出来。如何推动这种现代服务,培育现代服务的发展,推动生产性企业的外化,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各种优质资源和要素在上海集聚,但没有很好地转化为创新动力,环节

上还有欠缺。

王一鸣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是制度性因素。从管理模式来看,可能还在用制造业的管理制度来推动服务业。制造业要求政府主导,制造业是标准化的。政府集中配置资源,有利于制造业规模化发展,但服务业则千差万别且多元化,需要个性化特征,需要最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如果用很固定的模式,很规范的东西去约束,就很难成长。服务业的发展也要求制度上放松管制。